

0308

黄骅市文史资料

第三辑



范
海
印



政协黄骅市文史委员会编

黄骅市文史资料

第三辑

黄骅市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沧出准字(1991)第133号

印刷：黄骅市印刷厂

出版：一九九二年三月

工本费：

主 编： 王新华
朱建枝
顾 问： 褚连有
魏登瑞
董玉峰
李志明

目 录

新海县抗日救国会的创建和初期活动

- —— 兼忆杨洪恩、刘宝田、孙炳炎等先烈
..... 辛国治口述 王新华整理 (1)

张之江回忆录 (8)

张之江先生的一生 庞玉森 (29)

张之江与中国武术 庞玉森 (50)

张之江先生的二、三事 田 芜 (63)

缅怀孙安岭烈士 刘恩恒 (66)

他救过刘关英 张海峰 (69)

我当盐工40年 赵宝珍 邵泽升 (71)

生则“思民”死则报国

—— —— 回忆姜恩民烈士 郑红岗 (76)

战斗在渤海湾上 刘建选 (79)

苗庄子伏击战 朱廷枝 (192)

发生在黄骅境内的惨案

一、黄骅县城第一次惨案

—— —— 回忆坚守县政府片断

..... 李义全 朱建枝 (195)

二、李官庄惨案 田 芜 (200)

三、六十六惨案 朱文明 (203)

四、十八辆辫子车的遭遇 吕广州 (205)

杨家堡怎样从地图上消失的 王宝庆口述

辛国治 辛国树 龚俊来 王新华整 (207)

- “羊木、吕家桥过雁拔棵毛”的由来………吕广州 (214)
肉丘坟……………张海峰 (216)
难忘的岁月……杨中兴口述 杨宝顺 邵泽新整理 (219)

新海县抗日救国会的创建和 初期活动

——兼忆杨洪恩、刘宝田、孙丙炎等先烈

辛国治口述 王新华整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新海县（今黄骅市大部辖区）各方面的政治势力开始分化。在这国破家亡、民族危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的政府县长跑了，县政府解散了，许多区政府也解散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一些地主武装和土匪四处举起旗帜割据地盘。有的等待观望，看风使舵；有的走向卖国求荣，投靠日伪，助纣为虐，扼杀民族解放力量的道路。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满怀救国热情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奋不顾身，毅然决然地走向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成为新海县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新海县抗日救国会就是在我党的领导和他们的积极活动之下创建的。

事变前后，杨洪恩同志经常与我接触，介绍抗战形势，谈论抗日救国的思想和行动。杨洪恩是杨庄村人，1913年生，与我是姨兄弟，盐山高小毕业，后到天津制皮厂学徒。1933年考入天津第一师范，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运动过后，杨洪恩便回到家乡，进行宣传和发动抗日救国活

动。在杨洪恩的影响下，我知道了当时全国的抗日形势，知道了我党提出的抗日十大纲领，知道了学生运动目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也懂得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许多道理，初步产生了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思想。七·七事变后经杨洪恩介绍，我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当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外围组织，对外保密。我又介绍了韩道仁、杨洁如、辛月让等人入队。

1937年10月的一天，杨洪恩把刘宝田、孙丙炎和我召集到他家。刘宝田，羊二庄附近小刘庄村人，盐山师范毕业，在羊二庄一带教书，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丙炎，许官大赵村人（黄骅同志牺牲时就住在他家），许孝子高小毕业，也是我党党员。因为我们四人之间有亲戚关系，又相互了解，一些活动首先统一思想。杨洪恩对我们说：“当下，大敌当前，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大事，一个中国青年，就要走抗日的道路，为国家，为人民挽狂澜。一个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给祖国，给民族留下的贡献应是长远的。”他号召我们献身民族解放，献身革命，即使牺牲也要死得壮烈，死得有价值。

那时我们已经听到在乐陵盐山县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总会，发了布告。邢仁甫担任“总会”主任，兼抗日救国军司令。其他领导人还有范晋泉、崔月楠、邸玉栋、马振华、杜苛舟等。杨洪恩说：“我们抗日活动必须在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下统一进行。我们必须与他们取得联系”。我们也都同意这样做。于是我们选派杨洪恩齐耀庭等为代表，去乐陵与抗日救国总会联系。

杨洪恩、齐耀庭同志到了乐陵，见到了“总会”主要领导人邢仁甫，详细讨论了新海的形势和开展抗日活动的意

见。齐耀庭同志暂留在总会，杨洪恩同志回来后，按总会的指示精神积极活动。于当年初冬时（约在11月）成立了新海县抗日救国总会第11分会。主任是杨洪恩，成员孙丙炎、刘宝田、齐耀庭，我任分会秘书。后来我又发展了辛月让、韩道仁等人入会。因是单线联系，别人发展的会员我就不清楚了。分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我们接头和活动的联络点有三处：一是在杨庄杨洪恩家，二是孟二庄齐耀庭家，三是羊二庄前街“三义成”自行车行。“三义成”车行是小马庄高绍龙、杜文焕等三人合伙开办经营的修理自行车小铺。高绍龙是我的表兄，也是刘宝田的舅父；杜文焕是高绍龙的结盟兄弟，他们都有抗日救国的思想，所以很支持我们的活动。

第11分会的行动总则是负责宣传、发动、领导新海县的抗日救国运动。“总会”曾派崔月楠同志前来指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三项具体任务：一是争取李景文和窦同义，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二是打击孤立国民党在新海县的反动势力潘恩沛；三是打通天津水陆通道，为“抗日总会”提供必要的军用物资和军火。

当时新海县的武装力量：一是各地地主武装——民团纷纷扩大力量。如齐家务袁氏地主的武装，齐庄刘效春的民团；二是土匪武装，如窦同义、李景文，他们占据峻口；三是国民党的潘恩沛部队也竭力扩大势力。潘是沧州人，国民党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带着蒋介石的委任状，来到新海县住在中花寨他岳父家，拉起30来人，两挺机枪（高树勋部队来冀鲁边后，委任他任沧县长）。以上武装有的打着抗日的旗号，有的打着保家的旗号，到处向农民渔民催粮讨税。

我们抗日救国会曾几次派人员与潘恩沛会谈。我们的目的是想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潘强调他是国民党正统，叫我们必须接受他的领导。我们对他说，我们是救国分会，服从救国总会领导，是独立的抗日力量，联合对敌，我们之间不能谁服从谁，潘不接受。

1938年春节前的一天，我接受了“救国会”给的任务，到岐口去说服窦同义和李景文，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事先我先派赵××（赵博生的本族弟弟）与杨兴州（杨洪恩的哥哥）前去与窦同义和李景文接头。因赵××与窦同义很好，杨兴州与李景文也认识，借他们的朋友关系，征得窦、李同意，愿与我们会谈。

那天，天气很冷，杨兴州、赵××和我一行三人，按约定时间到了岐口。经过了戒备森严的几层门岗，找到了窦、李的司令部。窦、李二人早已等候，很客气地迎接了我们。接谈中我们坦诚地说了我们的观点：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李景文说，他们是草莽英雄，只为占个地盘，占地为王，不图什么大事业；如果打出抗日的旗号，怕引来日本，就不好站脚了。窦同义也是这个观点。

我们分析了他们的态度，所以对抗日有顾虑是怕影响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我们便针对他们这一顾虑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说，抗日救国是当前全国各民族的大事，也是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谁抗日谁得民心；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不仅可以牢牢站脚，还可以很快发展壮大。现在日本的大军只能顾及铁路沿线和大城市，铁路东各县还不见日军一兵一卒，苦海沿边的岐口他们更顾不及了；再说，以后日军即使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战，最后的胜利也是我们的。

经过一天的交谈，窦、李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同意联合抗日。由“抗日救国会”向窦、李发了委任状，命名为“抗日救国军 31 支队第 21 路军”，简称“21路”。

这个阶段，我还经常通过东花寨我的同学沈凤沼（其父在天津一个毡店工作）到天津购买纸张、油墨，供“总会”和“分会”印发宣传品。

对地主武装，我们本着扩大统一战线的原则，尽力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加强抗日力量，一致对外，避免产生对立情绪。但潘恩沛就不同了，他经常打着抗日的旗号，向地方要钱要粮，激起了地主武装的强烈反抗。1938年5月，潘恩沛向齐庄地主刘效骞要捐要税时，刘抗拒不交。潘恩沛以武力相逼，刘以民团相抵。刘的当地民团力量不足，就连夜奔赴外地，勾来沧县、南皮、盐山、青县、无棣等五县的民团力量，包围了中花寨潘恩沛的驻地，想一举歼灭潘的全部武装。刘效骞的儿子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潘的部队打死的。想不到在第二天夜里，潘率部突围逃跑，从冯家堡坐船，到惠民一带投奔国民党改编的民团，无棣土匪部队刘景良、张之良去了。只有个别人后来投奔了八路军。

潘离境后，“抗日救国总会”分析了新海县的形势，鉴于刘效骞对“11分会”存有戒心，怕发展成潘恩沛第二势力，我们为了不与刘正面产生矛盾，决定采取暂时回避的策略。1938年6月，“抗日救国总会”派来联络员，指名杨洪恩、刘宝田、孙丙炎、辛国治在当地抗日活动中目标较大的4名同志，调乐陵“抗日救国总会”另行分派工作。

1938年初夏，我们收完了麦子，4人凑到杨庄，备了4辆自行车，起了个大早，到乐陵县“总会”报到去了。

很快我们各自分配了新的工作：杨洪恩到庆云县任“抗日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县长职务），刘宝田到无棣县任同一职务，孙丙炎到宁津县工作。我当时只有17岁，是4人中最年轻的，又没有入党，组织上派我到驻乐陵县的军政学校学习。

军政学校我们是第一期学员，分民运、军事、政治三个队。我被分到政治队，主要学“持久战”理论，培养目标是连队指导员。入学不久我入了党，任政治队的党支部书记。萧华、符竹亭都在军政学校作过报告。萧华讲的《平原抗日战争是否能坚持》的理论观点，具体贯彻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光辉战略思想，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使大家热血沸腾，信心百倍。学习结束后，分配作“民先”工作（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

约在1938年6、7月间，我随部队到了韩村（现黄骅市黄骅镇）。住在一个地主的家里。常与当地青年韩天伦、王世延、王长安、向克、胡连城等同志接触，后来，他们成立了“新海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不少进步学生参加了这一组织。

当时，我们计划建立新海县抗日政府，但李景文也带他的部队住在韩村，背后还有很多国民党特务人员。我们进驻韩村开始阶段工作还算顺利，但由于李、窦内都有坏人挑拨，李、窦的抗日立场也不坚定，逐步对我们疏远，后扬言要把我们赶出新海。

为避免正面冲突，保存统一对敌的力量，我们暂时放弃了建抗日政府的工作，把部队撤退许官、赵村一带。原计划把韩天伦等同志也带出来，但因临行紧急，未及通知。

1938年秋后，韩天伦同志也到乐陵，其余同志也先后参

加入了八路军，成为黄骅县青年早期抗日救国的一批骨干力量。

新海县的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几位革命先驱离开新海，继续战斗。杨洪恩同志转战在鲁北一带，任过乐陵县长，家中房子被日军烧掉，哥哥杨兴州被汉奸王二逮捕活埋。1942年在任冀鲁边区二专署办公室秘书主任时在临邑县的辛集村被敌包围。在带领群众突围时不辛被俘。敌人问谁是八路？他为保护群众，自己站出来承认：“只我一个。”敌人把他带到一个院里，室内摆上酒席，室外布下铡刀和狼狗。叫他自由选择。敌人问他一句，他说一个不知道，他说一个不知道，敌人就叫狼狗咬他一口。最后全身咬烂，鲜血流尽，杨洪恩没暴露组织和同志一个字。1944年临邑县人民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为杨洪恩立了石碑。

刘宝田同志于1941年在无棣牺牲。他兄弟六人，在抗战中牺牲四人。孙丙炎同志在宁津县牺牲。一代忠魂应留在黄骅市人民的心中。

作者简介：

辛国治，70岁，生于杨家堡，后迁至中花寨。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政委，已离体。

王庆庄，71岁，生于杨家堡，现住新农村，渔民。

辛国树，64岁，生于杨家堡，现住新农村，渔民。

龚俊来，30岁，新农村广播站编辑。

张之江回忆录

(一) 动策滦州革命 响应武昌起义

辛亥年，随军秋操大演习，陆军第二十镇由奉天新民屯开拔，经过山海关师次滦州，正值武昌起义。当偕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张振扬、张树声、郭凤山、龚柏龄、周文海、石敬亭、李德盛诸同志决定在滦州起义，响应武昌。复经清廷派军机大臣吴禄贞①驰至滦州宣抚，经吴禄贞一番慷慨激昂的鼓励和策勉，革命情绪益增浓厚，多数同志主张积极发动，成败与否非所预计。继由孙中山先生代表白雅雨同志衔命抵此宣慰鼓励一切。是时在召集之大会中，公推冯玉祥同志为滦州方面军之总参谋长兼临时召集大会之主席，王金铭为滦州起义军之都督，施从云为滦州方面军之总司令，余为骑兵指挥官。

编者按：张之江系原国民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后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这篇回忆录是张之江亲属提供的，撰写时已达八十高龄，是篇未竟稿。本稿在发表时，进行了标点和分段，除改正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外，均按原稿照录。

① 吴禄贞曾任第六镇统制，未任过军机大臣，恐系军机大臣派吴至滦州之误。

——编者注

雷庄一役固予清兵一重创，以助革命军之声势而寒清廷之胆，但在清廷肘腋之下，后续重兵如卢永祥、王怀庆等部陆续增调。源源接济，革命孤军苦战，毕竟众寡悬殊，结果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数十同志惨遭汉奸王怀庆等包围杀害，所有爱国革命同志以身殉国，舍生取义矣。

张之江脱险重围，化装逃亡上海，企图参加北伐。滦州革命军受挫后，清廷下令严缉逃亡的革命分子。余只身化装，头置假辫，戴瓜皮帽，换着商人服装，携带简单行李，潜赴秦皇岛。斯时各地清兵侦缉革命分子极严，犹如天罗地网难得逃脱。甫入旅店稍息，清兵继而踪至，照例检查追究一番。去后，余看光景必须快走，迟缓则祸患莫测，当即付钱与茶房，请其代购船票赴烟台或上海均可。回报云，烟台船已开走，仅有驶沪之船（别号“大肚子”），但客位已满，停止售票。遂婉言请托茶房向船上通融，自购芦席一张，铺置于煤仓炭堆上。旋即接洽妥协，偕茶房帮携行李上船。抵码头时，目睹清廷守兵提刀持枪盘查森严，余行李共计三件，内尚有兵学书、制服等件，携行时，竟未计及关卡之检查，心中默念早知有这些手续，决不携带此项物件，但时势迫切无可如何。当即由负责者斥令一声检查，向余示意问道：“哪是你的？”余用手指明。又喊“放下！”余心中感觉今日最难度过此关矣，只好听天由命而已。码头上负责人（或系领袖）头戴红缨帽，身穿开系袍，随从提刀者二人，向余个人盘诘后又说：“打开你的行李。”斯时余故作镇静：“我行李中并无私货，你要检查请你自己打吧！”检查人即将余之长捆的一件动手开解（斯时余默祷上天恩佑，行李中多系革命逃亡之证），唯一生死关头，只在转瞬之间。余目睹检查人解至尚余量后中间一扣时‘斯人竟仰面精

停，若有所思，继而用足踢蹴行李，向余示意曰：“去吧！”余即呼帮协人曰：“扛起快上船！”以后引入煤仓，坐在特设之苇席上，多付小帐给旅店帮助余之茶房，欢欣接受，感谢别去。

回忆经过秦皇岛轮船码头受检查之情景，居然能转危为安，演变到此，亦觉不幸中之大幸也。虽然坐卧煤堆，比较钢丝沙发还显宝贵，还更知足。即将行李解开，随意坐卧，船未开时尚可偏安。余静思久之，感觉上帝之恩佑，高妙莫测，终身没齿不能忘也，否则何堪设想。及船开行后，船受风浪震撼，煤堆因而坍塌，卧铺逐渐被煤掩盖无余。虽屡经扫除，煤屑终至于扫不胜扫，非仅整个铺位陷入煤堆，所有的人、物尽成黑漆一团，余之全体大有酷似黑人面貌矣！只因舱内空气污浊，尚能常出舱而呼吸新鲜空气。

偶见一人头戴四块瓦的毡帽，身穿商人衣履，细视良久认清是滦州电报局局长顾某，系一忠实革命同志，在酝酿起义过程中，余曾数度负情报责任，检查过邮电，与顾君接洽数次，伊颇热诚相助，亦为清廷严缉分子，化装逃亡。船上巧遇，伊始作垂首萎靡状态，余注视良久，辨得十分清楚，确系顾君无疑。余姑戏之，至伊背后双手抱住：“我可得着你了。”伊吃一惊，余遂放手游说：“是我，认识我吧？”伊即认清，遂即握手言欢，彼此畅谈个人经过。余河北省人，初次赴沪，竟巧遇一无锡籍的革命同志，精神上颇觉欣慰。

抵沪时下船后，同寓二洋泾桥长春栈。翌晨，顾买报阅读有关滦州起义之革命军被清兵包围剿灭，甚少漏网者，滦州电报局局长顾某亦被惨杀之说。顾由床上奋然跃起，以报载示余曰：“请你看看这消息。”伊表示急欲归家一行，诚恐伊家中人对于此息有所见闻，惦念不置，立即向余告

辞，余亦无可如何。途遇良友深以为幸，匆匆作别，怅望无似。

余当向上海沪军都督上书，叙述滦州革命起义经过，并坚决请缨，志愿参加北伐为革命服务。旋经该府批示：“千里来投，大义昭然，着人事科存记，听候任用”云云。旅店住候有日，川资行将告罄，既无消息，只好北返。经青岛、济南，便道递归故乡一行。斯时适逢清廷退位，共和告成之消息传来矣。

（二）调解晋绥龃龉和肃清惯匪

冯玉祥同志现任北京政府拱卫军备补团第一营营长，余到京与冯晤面后，即入陆军将校研究所，对于军事学术又下了功夫研究一番，如远战、近战、火器战、白兵战、古代兵经等等。一九一二年调充绥远将军府参谋，与老同学张树声同工于晋北东路司令部。树声个性直爽率真，因与晋省派来之魏参谋意见不合，发生龃龉，致起冲突。魏参谋含怒回晋，该方面竟藉此事诬控树声以阻挠裁兵之罪名于北京军政执法处。旋接该处电调树声去京审讯，临行之际嘱咐树声于晋方捏控罪名，万万不可承认。去京后约两周里，接到树声来信云，业已认供七条，反复详审，罪情严重，足以致死而有余矣。

盖晋方与绥远张将军因事权关系，往往发生磨擦，酿成纠纷者往往有之。晋方竟欲藉故置树声于死地，姑给张绍曾将军以难堪，泄其积怨之愤恨。余深思熟虑，觉得此案之正义伸得昭雪与否，公谊私情所关甚大，势须积极策进设计挽救。认定挽救此案之主要关键，系于余个人之设计扭转，责